

新 传统主义

郑家栋 主编

儒学与 现代民主

何信全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新传统主义丛书

儒学与现代民主

——当代新儒家政治哲学研究

何信全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儒学与现代民主/何信全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7

(新传统主义丛书/郑家栋主编)

ISBN 7-5004-2954-1

I. 儒… II. 何… III. ①儒家-研究②儒家-关系-民主
IV. B222. 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10765 号

责任编辑 冯春风
责任校对 尹 力
封面设计 王 华
版式设计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64030272

网 址 <http://www.cass.net.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1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5.75

插 页 2

字 数 132 千字

印 数 1—2000 册

定 价 12.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何信全 台湾嘉义人，1954年生。
政治大学哲学系学士，政治研究所
硕士、博士。曾任政治大学哲学系
讲师、副教授，现任政治大学哲学
系教授兼系主任。著有《晚清公羊
学派的政治思想》、《海耶克自由
理论研究》、《儒学与现代民主—
当代新儒家政治哲学研究》等书，
另有其他相关论文多篇。

郑家栋 主编

新传统主义

- | | |
|-------------------|------------|
| 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 | [美国] 列文森 著 |
| 东亚价值与多元现代性 | 杜维明 著 |
| 合内外之道 | |
| ——儒家哲学论 | 成中英 著 |
| 断裂中的传统 | |
| ——信念与理性之间 | 郑家栋 著 |
| 儒家思想开拓的尝试 | 刘述先 著 |
| 儒学与现代台湾 | 黄俊杰 著 |
| 当代儒学的自我转化 | 李明辉 著 |
| 儒学与现代民主 | 何信全 著 |
| 台湾儒学的当代课题：本土性与现代性 | |
| | 陈昭瑛 著 |

责任编辑：冯春风

封面设计：王 华

目 录

自 序	(1)
第一章 导论	(3)
一、当代新儒学的发展与定位	(3)
二、儒学通向现代民主的问题	(8)
第二章 梁漱溟论中国民主化的难局	(12)
一、思想的转折与形成	(12)
二、中国不能民主化的原因	(16)
三、中国文化的特殊精神	(21)
四、解开难局的探索	(27)
第三章 熊十力与儒家新外王理论之开展	(35)
一、体用不二的哲学	(37)
二、儒学之体与民主科学之用	(41)
三、儒学、民主与社会主义	(49)
四、若干评估	(58)
第四章 牟宗三论儒学通向民主的辩证进路	(65)
一、儒学开出民主的内在难题	(65)
二、从理性的运用表现转出架构表现	(71)
三、民主之辩证开展进路的若干省思	(78)
第五章 唐君毅论儒学中的自由精神	(86)
一、自由的层次与孔子为仁由己之自由	(87)

二、人格平等与宽容精神	(94)
三、以理想主义为基础的自由哲学	(102)
四、积极自由哲学纠结之疏导	(108)
第六章 徐复观论儒学与自由民主	(113)
一、性善论与个人的自由平等	(114)
二、德治与政府权力的限制	(118)
三、性善论与德治观念的负面效应	(124)
四、儒学的自由民主根源与局限	(128)
第七章 张君勱论儒学与民主社会主义	(131)
一、思想的会通与形成	(131)
二、哲学之基础	(133)
三、民主社会主义：自由与社会公道的兼筹并顾	(141)
第八章 综论：儒学通向现代民主的难题与出路	
——从自由观点之检视	(150)
一、当代新儒学与自由主义	(150)
二、自由哲学的两种类型	(152)
三、当代新儒家的积极自由观念	(159)
四、儒家式的积极自由论与现代民主	(164)
五、儒家的自由民主之路	(169)
参考文献	(173)

自序

作为中国两千多年来的立国之道，儒学与现代民主之间的理论关联，一直是一个重大而又饶富兴味的课题。此一课题，不仅关系中国文明与政治的出路，抑且攸关整个东亚儒教文化圈之未来走向。晚清之际，多少思想人物致力于探索此一课题，殚精竭虑，试图提出融通之道。惟彼时对西方现代民主之理解毕竟有限，于儒学与现代民主二者之间，难免多所附会，实不足以言深刻的理论反思与建构。迄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对西方自由民主之理解，固有长足的进步。惜乎矫枉过直，在对儒学以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欠缺尊重与同情了解之下，对于此一严肃的思想课题，似乎仍无法从简单的两极论断模式中超拔出来，以至限制了可能的研究成就。晚近以来，在中文世界之中逐渐摆脱过去的研究模式，而注目于儒学与现代民主二者之间微妙而复杂的关联，从而开拓出崭新的研究视野，并渐次累积了相当的研究成果。

本书是笔者继《海耶克自由理论研究》（台北：联经，1988年）一书之后，进一步探讨作为现代民主哲学基础的自由主义，与中国儒学传统之间复杂的关系，五六年来的研究成果。本书以当代新儒家为例示，探讨其主要代表人物围绕儒学与现代民主此一思想主题建构之政治哲学。笔者尽可能本乎客观平情的态度，深入各家之理论结构，并在此一思想主题定位之下，进行探索与评析。全书大部分篇章，曾经先后发表，并蒙学界先进、朋友多所指教，自觉获益良多。其中第二章于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发表，并

收入《近代中国历史人物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1993年);第四章以《儒学与现代民主的融通——牟宗三政治哲学探析》为题,于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所发表,并收入刘述先主编:《当代儒学论集:挑战与回应》(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所,1995年);第五章发表于《国立政治大学哲学学报》第二期(台北:政治大学哲学系,1995年);第六章以《在传统中探寻自由民主的根源——徐复观对儒家政治哲学的新诠释》为题,于第二届当代新儒学国际研讨会发表,并收入李明辉主编:《当代新儒家人物论》(台北:文津,1994年);第七章以《以会通中西重构立国之道——张君勱政治哲学探析》为题,于传统中国文化与未来文化发展学术研讨会发表,并收入沈清松主编:《诠释与创造——传统中华文化及其未来发展》(台北:联合报文化基金会,1995年);第八章以《当代新儒家自由观念的性格及其问题》为题,于第一届当代新儒学国际研讨会发表,并收入《当代新儒学论文集——外王篇》(台北:文津,1991年)。

在笔者从学过程中,如果不是师长的鼓励、朋友的切磋以及家人的支持,学术研究此一漫漫长路,恐怕难以为继。本书出版前夕,特别要向每一位曾经真诚互动的师友以及家人,表达衷心铭感之意。

何信全

一九九六年岁初序于台北

第一章

导 论

一、当代新儒学的发展与定位

中国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引入以民主与科学为主要内涵的西方近代思潮以来，作为本土主流思潮的儒学，可谓首当其冲，受到严厉地挑战与考验。不过，尽管五四之后西方思潮一波接着一波涌入，从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一一成为强势思潮，主导当代中国政治、社经以及文化之发展。然而本土的儒学，虽一时退却，似乎未尝被击垮。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正如火如荼展开之际，梁漱溟站在重新诠释的儒学立场，与来自西方的新思潮直接抗衡。在此一儒学不绝如缕的时刻，梁漱溟在儒学的延续上，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就此而论，梁漱溟可以说是当代新儒学运动的先驱。

广义言之，当代新儒学运动乃是透过对儒学重新诠释，以彰显其现代意义与价值的思想运动。就主要的推动者而言，包括若干哲学立场相同或不相同的哲学家，诸如梁漱溟、冯友兰、熊十力、马一浮、张君勱、钱穆、贺麟、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人。在这一意义之下，他们可以称为“当代新儒家”。不过，当代新儒家一词，除了上述广义的用法之外，尚有比较狭义的使用法，即以一九五八年的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勱、唐君毅四人联名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一文，为当代新儒学运

动的基本纲领。^①以此一新儒学运动基本纲领为中心，除了署名的四人之外，基本上只有梁漱溟与熊十力，宜以当代新儒家称之。^②本书探讨当代新儒家的政治哲学，限定在狭义的法，亦即以梁漱溟、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以及张君勱六人为范围。

当代新儒学的发展，基本上是在中国近代以来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语）的脉络之中，思考中国民族与中国文化的出路。一九四九年中国大陆的变局，更刺激了他们在这一思想主题的深入探索。^③尽管当代新儒家致力于探求中国未来政治、社经与文化的出路，然而就中国的现实发展而言，至少迄至目前，似

① 本文发表于《民主评论》9卷1期，收入张君勱：《中西印哲学文集》（台北：学生，1981年），第849—904页。

② 广义与狭义的当代新儒家分法，参见刘述先：《由当代西方宗教思想如何面对现代问题的角度论儒家传统的宗教意涵》一文。收入刘述先主编：《当代儒学论集：传统与创新》（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1995年），第20页。余英时则指出“新儒家”的三种用法：第一种是中国大陆的流行用法，几乎任何二十世纪中国学人，凡对儒学不存偏见，并认真研究者皆称之；第二种是只有在哲学上对儒学有新的阐述发展者才称之；第三种是海外流行的本义，即专指熊十力开创的哲学学派。见余英时：《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台北：三民，1995年再版），第58—59页。刘文中狭义的当代新儒家指“由熊十力开创，唐、牟加以发扬光大的思潮”，与余书所谓“熊十力学派”相当。张灏则指出，牟、唐、徐固系熊十力之门人，不过他们的思想亦受到梁漱溟之影响，唯影响程度有所不同。Hao Chang, “New Confucianism and the Intellectual Crisis of Contemporary China”, in Charlotte Furth (ed.), *The Limits of Change: Essays on Conservative Alternatives in Republican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276—277.

③ 黄俊杰指出，战后台湾儒学研究的共同特征有二：一是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二是对中国大陆变局的关怀。这两个特征，确实明显表现在当代新儒学的发展上。参见黄俊杰：《战后台湾关于儒家思想的研究》，收入氏著：《战后台湾的教育与思想》（台北：东大，1993年），第208—286页。

乎并未能产生重要影响。^①不过,当代新儒家致力推展的新儒学运动,虽然对中国现实政局影响不大,但是就理论层次而言,他们以儒学为主体,在开创儒学通向现代政治、社经与文化的系统理论方面,却获致相当丰硕的成果。

对于当代新儒家展示儒学现代意义的理论成果,如同所有的重要哲学理论一样,受到各方的争论。事实上,在新儒家本身,彼此理论观点亦不尽一致。大体而言,当代新儒家肯定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文化,并以由孔孟至宋明心性之学为儒学的主流。此一儒学主流,立基于性善论,做为道德实践之基础,形成一由道德实践而证成的形上学。《宣言》中指出:

人生之一切行道而成物之事,皆为成德而成己之事。……皆不外尽自己之心性。……以印证吾人与天地万物实为一体。而由此印证,即见此心此性,同时即通于天。于是能尽心知性则知天,人之存心养性亦即所以事天。而人性即天性,人德即天德,人之尽性成德之事,皆所以赞天地之化育……所以宋明儒由此而有性理即天理,人之本心即宇宙心,人之良知之灵明,即天地万物之灵明,人之良知良能,即乾知坤能等思想,亦即所谓天人合一思想。……由先秦之孔孟以至宋明儒,明有一贯之共同认识。……共认人能尽此内在心性,即所以达天德,天理,天心而与天地合德,或与天地参。此即

^① 在中国大陆,诚如李泽厚所言“比起马列来,他们的力量、影响、作用确乎渺不足道。”见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台北:风云,1990年),第337页。在战后台湾,则由于新儒学的“中国大陆主体性”并未转化为“台湾主体性”,因此就对台湾政治、社会的实际影响绩效而言,显然颇为有限。参见黄俊杰:前揭书,第285页;杨儒宾:《人性、历史契机与社会实践——从有限的人性论看牟宗三的社会哲学》,《台湾社会研究季刊》,1卷4期(1988年冬季号),第140页。

中国心性之学之传统。^①

这一段话，完整地勾勒出当代新儒家认同的儒学，乃是由孔孟到宋明的心性之学；而在宋明心性之学中，当代新儒家基本上认同陆王心学的传统。我们由上述人与天地万物实为一体，以及人之本心（良知）为宇宙之心，乾坤之基等论述之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此中陆王心学一系的意涵。新儒家此一以陆王心学为儒学正宗的观点，在儒学内部难免引发争议。余英时在比较熊十力与钱穆的儒学观点时指出，熊十力在理学上特尊陆王，而钱穆则以朱子为宗。他进而对《宣言》提出这样的批评：

《宣言》开宗明义以“心性之学乃中国文化之神髓所在”，便显示出熊十力的特殊观点。……如果说心性之学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重要的特色，熟悉中国学术传统的人也许不致提出太多异议。但是要得到《宣言》中的论断，这后面需要多少层的预设和多少类的经验证据呢？^②

质言之，余英时并不同意以陆王为儒学正宗的观点，这是何以他会以“熊十力学派”称呼当代新儒家的原因所在。

撇开此一儒学内部孰为儒学正宗的争议不论，当代新儒家本乎陆王心学与西方近代康德（Immanuel Kant）、黑格尔（G. W. F. Hegel）之哲学会通，形成以儒学为主体综摄中西的哲学系统。此一会通中西哲学之脉络，在张君勱、唐君毅与牟宗三的儒学论述中，表现相当明显。相较之下，梁漱溟与熊十力则多得力于佛家唯识学的启发，而徐复观的形上思辨兴趣较淡。不过尽

^① 《宣言》，第869—870页。

^② 余英时：前揭书，第68—69页。

管他们的理论之间存在某些不尽一致之处，然而整体而言，他们的理论之理想主义（唯心主义—idealism）性格，则十分明显。

劳思光认为当代新儒家哲学此种唯心主义性格，使他们采取黑格尔模式（Hegelian Model），将生活领域（given world）化约到理念领域（world of idea），亦即将存在世界化约为思想，取消生活领域的独立性，将世界视为自觉理念秩序的实现，因而重视内在的精神如何呈现而为一外在的文化。在此一思想模式之下，常会忽略社会运作与结构（生活领域）的独立性，认为都是思想（理念领域）所产生。^①此一批评，对熊十力与唐君毅、牟宗三三位致力于建构形上体系的新儒家而言，具有一定程度的批判力。严格言之，他们三人并非不重视生活领域的条件对于历史发展的影响。不过，整个构思的重心，确实放在儒学与现代文明（例如民主、科学、社会主义等等）之间内在理路（inner logic）的疏导之上。至于梁漱溟、张君勱与徐复观三人，并未致力于形上体系的建构，对于儒学未来发展的历史条件颇多精彩的论述。事实上，梁漱溟便对熊十力提出这样的批评：

其论断事情，总是既把局面之所以落到如此，归咎于人们的主观思想或行动上。……这种翻来覆去只看到人们主观作用的，或社会上层建筑之相互影响的，不正是今所谓唯心论、所谓主观主义吗？^②

梁漱溟探究儒学之进路，由宋明儒学入，而特别推崇晚明泰州学派。^③其在儒学中，基本上属于陆王心学系统。张君勱与徐复观在

① 劳思光：《中国文化路向问题的新探讨》（台北：东大，1993年），第21—23页。

② 梁漱溟：《忆熊十力先生》（台北：明文，1989年），第15—16页。

③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台北：虹桥，1968年），第138页。

儒学中，基本观点亦立基于陆王心学一系。^①由此可见，即使在哲学上立基于理想主义、唯心哲学，在探究儒学与中国未来发展问题上，于主观的思想领域与客观的生活领域二者之间，不必皆采取只见前者而忽视后者之进路。当代新儒家诸人于此，显然存在某种论述轻重上的差异。

要之，当代新儒家在儒学派别之中，基本上属于陆王心学一系。他们致力于探究儒学与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基本哲学立场大抵一致，然而理论风格与观点则不尽相同。

二、儒学通向现代民主的问题

在当代新儒学的发展之中，如何透过对儒学的重新探索。诠释，以发掘一可以做为现代民主之理论源头，使中国在儒学基础之上，走出治乱相循的历史轨辙，步入长治久安的民主康庄大道，一直是最重要的思想主题之一。在《宣言》第九节探讨“中国文化之发展与民主建国”，第十节提出“我们对中国现代政治史之认识”，对现代中国民主建国与儒学传统之间的相关问题，提出了重要的看法。^②

关于儒学与现代民主二者之间，究竟存在一种怎样的理论关联，是一个引发长期争论的问题。萧欣义把此一问题的争论观点，归类为下列四大派：第一派主张儒家思想根本上是反民主、反自由、反人权的，惟有彻底打倒孔家店，才可能建立民主宪政。第二派

^① 张君勱与徐复观二人皆推重程朱学派在道问学方面的成就，并肯认儒学中此一重知识传统具有非常重要的现代意义。不过，他们基本上认同儒家以尊德性为首的宗旨，而此则只有植基于陆王心学之上。参见张君勱：《比较中日阳明学》（台北：商务，1970年），引言；《义理学十讲纲要》（台北：商务，1970年），第一章；以及徐复观：《象山学术》一文，收入氏著：《中国思想史论集》（台北：学生，1979年五版）。

^② 参见《宣言》，第880—888页。

则认为民主、自由、人权是西洋人的玩意儿,不合东方国情,民主、自由、人权泛滥,将使社会国家无法集中意志,以致万众万心,一盘散沙,终于亡国。第三派强调儒家思想完全符合民主、科学、伦理,要实行民主,必须从根源处推行儒家精神教育。第四派则认为儒家思想中有浓厚的民主、自由、人权的精神,但是在长期专制政治压制之下,儒家渗入了反民主、自由、人权的成分,甚至变质成为专制的护符,因此谈儒家思想,不能笼统反对或接受,而必须厘清种种混淆。^①此一归类,颇足以涵盖民国以来对于儒学与现代民主这一课题的各派观点。这四派观点之中,第一派可以说代表五四以来,在中国自由主义者之间流行的一种观点。就五四时期而言,诚如周策纵所指出,民主尽管是新知识分子经常使用的口号,且实并未受到充分地讨论与理解。特别彼时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注目于教育改革、学术研究与中国古典文献的重估,而少有人从经济体系与实际运作的角度,认真思考民主在中国之运用问题。这是何以在扮演攻击传统意识型态与体制的戏剧性角色之后,中国自由主义者对公众影响渐趋式微的主要原因之一。^②在对现代民主缺乏真正深入理解的情况之下,五四时期将儒学定位在反民主、自由与人权,重要的原因之一,是目睹民国以来反民主的袁世凯与张勋,利用孔子为帝制与复辟的护符。孔子与帝制之间这一层暧昧的关系,使他们对于儒学是否合乎民主共和国的精神,倾向抱持否定的态度。^③严

① 萧欣义:《一位不畏权势的当代儒者对民主自由的探索》。见其所编,徐复观著:《儒家政治思想与民主自由人权》(台北:学生,1988年再版),编序,第11—14页。

② Chow Tse-tsu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p. 228—230.

③ 杜维明认为“明枪易躲暗箭难防”,盖“五四时代真正糟蹋儒家传统的是那批以尊孔读经等表面上庄严体面的说教而从内部腐化儒术的军阀政客。”确是慨乎其言之。见氏著:《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台北:联经,1989年),第334页。并参见李泽厚:《前揭书》,第7页;郭成荣:《陈独秀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台北:联经,1992年),第80—81页。

格言之，站在以民主与科学为现代化主要内涵的观点，对儒学传统进行系统的批判，一直要等到以“五四后期的人物”^①自许的殷海光。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一书，对作为中国现世伦教的孔制，进行系统的分析与强烈的批判。不过，殷海光对西方自由主义的理解较为深入，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则似嫌不足。他把他所批评的孔制与儒学划上等号，而忽视由儒学转向传统孔制的过程中，法家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质言之，他所批判的传统孔制，实际上是儒学法家化之结果。^②由于没有能够看透传统孔制“阳儒阴法”之格局，以为“法家的思想，虽然有极精到的成就，但因一直被看作是唯‘术’联系在一起的派系而成不了大宗。”因而不免深致惋叹。^③

上述第二派与第三派的观点，或昧于情势，或一厢情愿，于此可以不论。至于第四派的观点，则诚如萧欣义所言，实为突破前三派局限，而达到另一研究的新境界。他推崇徐复观的儒学研究，正是代表此种厘清混淆，以彰显儒学中合乎现代民主精神成分的一型。^④依吾人之见，尽管彼此见解不尽一致，当代新儒家的观点基本上皆属于此一类型。他们在儒学与现代民主这一论题上，除了注目历史条件等外缘因素的影响之外，更致力于厘清二者在内在理路联系方面存在的困难，以及可能的疏解之道。尽管仍然存在许多争论，然而无可否认地，当代新儒家在儒学与现代民主此一论题上，获致值得重视的理论成就。

诚然，现代民主源自西方，乃是西方近代特定的历史条件与

① 殷海光：《殷海光最后的话语》（台北：环宇，1972年三版），第32页。

② 关于儒学法家化的问题，参见余英时：《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论儒、道、法三家政治思想的分野与汇流》一文，收入氏著：《历史与思想》（台北：联经，1976年），第1—46页。

③ 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台北：桂冠，1992年再版），第248，254页。

④ 萧欣义：前揭文，第15页。